



# 隋朝于黎阳修建漕仓原因探析

李 乔

**摘要:**黎阳仓为隋初四大漕仓之一,其设置的主要目的是解决京城长安粮食短缺问题,但在黎阳仓建成后,其在军需供应、赈济灾荒等方面的作用日益显现,更成为决定隋末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黎阳仓的设置既与当时的农业政策、漕运制度、粮食储存技术、军事战略有关,也与黎阳的地理位置、水运条件、粮食积蓄等有密切关系。

**关键词:**黎阳仓;漕仓;隋朝;选址

**中图分类号:**K2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669(2021)05-0072-07

隋唐时期,随着大运河的开通,漕运的用途日益广泛,其在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等领域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漕仓作为漕运的重要组成部分,担负着国家物资存储、转运、供给等任务,在保证市场供给,平抑物价,赈济灾荒,以及支撑国家政治、军事活动等方面都有着重要作用。因此,历代王朝对漕仓的选址都非常慎重,“不仅考虑在转运系统中的作用,在地域板块内也占据冲要,发挥战略预置作用”<sup>[1]</sup>。隋初所置大型漕仓,除黎阳仓外,大都位于洛阳、大兴之间的河、渭漕运通道沿岸。隋文帝为什么选择在远离都城,又位于黄河以北的黎阳修建漕仓呢?从当时的农业政策、漕运制度、粮食储存技术、军事战略,以及黎阳的地理位置、水运条件、粮食积蓄等因素来分析,隋置黎阳仓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 一、解决缺粮的现实需要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粮食是关系国家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头等大事,历代统治阶级都高度重视。隋都长安,地处关中,缺粮问题由

来已久,自汉代便屡有关中饥民就食外地的例子,如《汉书·食货志》有“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sup>[2]1127</sup>，“令饥民得流就食江淮间”<sup>[2]1172</sup>；《魏书》更有“京师民饥，听出山东就食”<sup>[3]55</sup>，“听民出关就食”<sup>[3]162</sup>，“诏人就食山东”<sup>[3]2396</sup>，“是岁年谷不登，听人出关就食”<sup>[3]2417</sup>，“分简尤贫者就食山东”<sup>[3]2850</sup>等多处记载；《北齐书》亦有“就食山东”<sup>[4]5</sup>的记载。随着周、隋两代“实关中”政策的实施，关中地少人多的矛盾更加凸显。隋自开皇初起，关中人口愈来愈多，史念海先生说：“关中平原为隋唐两代的都城所在，尤为重要。都城为人口集中地区。在一定人口的比例下，所生产的粮食是能够满足当地的需要的。人口增加了，就难免感到匮乏。这在隋初就已经显现出来。”<sup>[5]</sup>据《隋书·高祖纪》记载，隋开皇四年（584年）九月，因“关内饥”，隋文帝“驾幸洛阳”<sup>[6]22</sup>，至次年四月才回长安。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条件下，仅依靠关中地区的土地解决人口吃饭问题显然是行不通的，必须将山东粮食、物资调运至京师，才能解决关中粮食紧缺问题。为此，隋文帝决定开凿漕渠。

隋初主要是利用黄河、渭水等天然河流进

收稿日期:2020-05-26

作者简介:李乔,男,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郑州 450002),主要从事古代文献研究。

行漕运。大兴城至潼关间,旧有汉代漕渠,但因年久失修,京城向东只能靠渭河天然河道水运。由于河宽水浅,泥沙又多,漕舟往来困难,隋文帝任命郭衍为开漕渠大监,开通漕渠,“凿渠引渭水,经大兴城北,东至于潼关,漕运四百余里”<sup>[6]1469</sup>。漕渠的开通,不仅解决了京师粮食的运输问题,又使沿渠两岸百姓得到灌溉的实惠,因此被称为“富民渠”。但因工期紧张,渠道窄浅,漕运能力有限,“渭川水力,大小无常,流浅沙深,即成阻阂。计其途路,数百而已,动移气序,不能往复,泛舟之役,人亦劳止”<sup>[6]683</sup>。隋文帝命宇文恺再次开凿漕渠,“引渭水,自大兴城东至潼关,三百余里,名曰广通渠。转运通利,关内赖之”<sup>[6]684</sup>。广通渠开通后,漕运能力大大提高。

黄河中砥柱造成的漕运不畅是摆在隋文帝面前的又一难题。关于黄河砥柱,酈道元在《水经注》中是这样描述的:“河水翼岸夹山,巍峰峻举,群山叠秀,重岭干霄……自砥柱以下,五户已上,其间百二十里,河中竦石架出,势连襄陆,盖亦禹凿以通河,疑此阙流也。其山虽辟,尚梗湍流,激石云洄,浓波怒溢,合有十九滩,水流迅急,势同三峡,破害舟船,自古所患。”<sup>[7]117</sup>为解决黄河中砥柱险阻,调动丁夫运粮积极性,隋朝规定,能将漕米从洛阳顺利运抵砥柱之西常平仓的丁夫,可以获得免除徭役的奖励,“遣仓部侍郎韦瓚,向蒲、陕以东,募人能于洛阳运米四十石,经砥柱之险,达于常平者,免其征戍”<sup>[6]683</sup>,足见运粮的艰险和粮食对于关中的重要性。

漕运解决后,需要解决的便是粮食储存问题。隋文帝开皇三年(583年),因大兴城物资匮乏,仓廩空虚,难以满足京城需要,“开皇三年,朝廷以京师仓廩尚虚,议为水旱之备。于是诏于蒲、陕、虢、熊、伊、洛、郑、怀、邵、卫、汴、许、汝等水次十三州,置募运米丁。又于卫州置黎阳仓,洛州置河阳仓,陕州置常平仓,华州置广通仓,转相灌注,漕关东及汾、晋之粟以给京师”<sup>[6]683</sup>。黎阳、河阳、常平、广通等四大转运仓均设置在位置重要的地区,便利运输,“凡经过之处,以丁夫递运。要害之处,置仓场收贮,次第运之,以至京师。运丁得以番休,而不久劳。漕船得以回转而不长运。而所漕之粟,亦得以随宜措注,而或发或留也”<sup>[8]572</sup>。这些漕仓都占据着交通要

冲,有着各自相当的吸引范围。黎阳仓的设置目的就是依靠河北运河吸收仓粮,以河北地区为吸引范围,其虽在卫州境内,但并不归卫州管辖,清嘉庆《浚县志》就说:“黎阳仓与洛口并重,此非一邑之仓,天下之仓也。”<sup>①</sup>

## 二、修建粮仓的悠久历史

中国仓储历史悠久,考古发现表明在新石器时代便已开始使用窖穴储藏粮食。夏朝时,已建立起简单的仓储制度。春秋战国时,仓储思想已比较完善,《礼记·王制》就说:“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sup>[9]340</sup>管子认为粮食储备对于国家安危具有重要作用,《管子·国蓄》开篇就指出:“国有十年之蓄,而民不足于食,皆以其技能望君之禄也;君有山海之金,而民不足于用,是皆以其事业交接于君上也。故人君挟其食,守其用,据有余而制不足,故民无不累于上也。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故善者执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尽也。”同书《轻重甲》曰:“天下有兵,则积藏之粟足以备其粮。天下无兵,则以赐贫眡。”<sup>[10]1259、1462</sup>此后,历代都很重视粮食储备,西汉初期,政治家贾谊和晁错都曾对粮食储备的重要性作过专门阐述。贾谊曰:“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财有余,何为而不成?”晁错云:“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畜积,以实仓廩,备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sup>[2]1130、1131</sup>

太行山以东的华北平原自古以来就是农业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经济地位十分重要,而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漕运仓储就出现在今浚县境内。地处华北平原腹地的浚县,早在远古时期就有人类居住,境内大赉店、鹿台等仰韶文化至商周遗址中出土的大量石质镰、刀、铲农具表明,商周以前该区域农业已具有较高的发展水平。殷商时期,青铜农具应用于农业生产,加之对水资源的有效利用,浚县农业生产能力进一步提高。最早的粮仓巨桥仓出现在这一地区,说明该地粮食生产已达到一定规模,已有充足的粮食积蓄。宋高承《事物纪原·仓名》曰:“仓所以贮国储也。商有巨桥,汉有成皋、敖仓及常平,隋有黎阳,……武王发巨桥之粟,孔安国以

为纣所积之仓也。”<sup>[11]46</sup>这说明殷商时期的巨桥仓就是中国最早的粮仓。先秦史籍中,对巨桥仓多有记载,《尚书·周书·武成》载:“(武王灭殷后)散鹿台之财,发巨桥之粟,大赉于四海。”<sup>[12]294</sup>《逸周书·克殷》谓:“(武王)乃命南宫忽振鹿台之财,散巨桥之粟。”<sup>[13]182</sup>《史记》有“(帝纣)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巨桥之粟”<sup>[14]105</sup>,“(武王革殷)命南宫括散鹿台之财,发巨桥之粟,以振贫弱萌隶”<sup>[14]126</sup>等。这里所说的巨桥不是桥名,而是商王朝修建的大型粮仓,《尚书》注“发巨桥之粟”引孔安国传曰:“纣所积之府仓,皆散发以赈贫民。”<sup>[12]294</sup>《史记·殷本纪》“盈巨桥之粟”集解引服虔曰:“巨桥,仓名。许慎曰巨鹿水之大桥也,有漕粟也。”<sup>[14]105</sup>清嘉庆《浚县志》载:“巨桥,仓名。以为桥名者,误也。服虔曰:巨桥,仓名也。桥,器名也,纣性侈大,故大其器,则巨桥者,大仓也。”<sup>②</sup>纳兰性德亦言:“纣之巨桥,盖积粟之仓,而非桥梁也。”<sup>③</sup>

关于巨桥仓的位置有河南浚县、淇县,以及河北曲周等说法。浚县说最早见于明正德元年(1506年)《大名府志》,该志载:“巨桥,在(浚)县西五十里,商纣积粟之所。”<sup>④</sup>其后《明一统志》承其说:“巨桥,在浚县西五十里,纣聚粟之所,武王发巨桥之粟,即此。”<sup>⑤</sup>明代学者何乔远也认为巨桥在浚县西,“鹿台、巨桥,皆在是县(浚县)之西”<sup>⑥</sup>。《大清一统志》云:“巨桥乡,在浚县西五十里。明《统志》,即武王发巨桥之粟处。”<sup>⑦</sup>康熙《畿辅通志》:“巨桥,在浚县西五十里,武王发巨桥之粟,即此。”<sup>⑧</sup>

淇县说首见于明嘉靖《河南通志》,该志认为淇县东北吴里社即为殷纣聚敛粮食之所,和周武王克殷后散粟赈民之地,“巨桥,在淇县东北吴里社,殷纣王于此置仓以积粟。按,《周书》‘发巨桥之粟’,即此地也”。万历《卫辉府志》在说巨桥在淇县的同时,又说浚县亦有巨桥“巨桥,在(淇)县东北十五里吴里社,即商纣积粟处。《周书》‘发巨桥之粟’是也。……浚县西五十里亦有此桥”<sup>⑨</sup>。明代学者陆应阳认为鹿台、巨桥均在淇县境内,他在《广輿记》中说:“鹿台、巨桥,淇县。”<sup>⑩</sup>清初张三异在给明代杨慎《廿一史弹词》“巨桥粟,鹿台财”作注时说:“巨桥,仓名;鹿台,台名。故址俱在淇县。”<sup>[15]39</sup>清代学者

任启运也认为鹿台、巨桥均在淇县境内:“鹿台,台名。巨桥,仓名。故址俱在今淇县。”<sup>⑩</sup>

浚县、淇县两说中所指巨桥仓实为一地。顺治《淇县志》就认为巨桥仓原属淇县,行政区划调整后归入浚县:“巨桥,在县东北二十里,淇河之东,即殷纣积粟处。按,《周书》‘发巨桥之粟’,是也。……今其地亦割入浚版矣。”<sup>⑪</sup>清初曾参与修纂《河南通志》的汪价也认为,巨桥在浚县境内:“巨桥,在淇河之东,即殷纣积粟处。《周书》‘发巨桥之粟’。……今其地已割入浚版矣。”<sup>⑫</sup>

曲周说出现较早,唐代房玄龄在给《管子》“武王有巨桥之粟”做注时说:“巨桥仓在今广平郡曲周县也。”<sup>[10]1362</sup>杜佑《通典》载:“曲周,汉旧县,故城在今县西南。纣巨桥仓亦在于此。”<sup>⑬</sup>马端临《文献通考》亦曰:“曲周,汉县,有纣巨桥仓。”<sup>⑭</sup>但明清以来的曲周县志及广平府志却很少将巨桥仓载入,即便载入也都存疑。如,乾隆《曲周县志》就是“疑则传疑”的态度将巨桥仓附于该志古迹部分:“巨桥仓。按,《周书》,武成发巨桥之粟。《地理今释》云,巨桥在今直隶广平府曲周县东北。《通典》云,洺州曲周县,纣巨桥仓在此。今河南卫辉府淇县东北十五里亦有巨桥,非也。又《文献通考》《一统志》俱载巨桥于曲周,而《广輿记》则载入淇县。今考纣都朝歌,朝歌今淇县,如比干墓、南单台朝涉淇澳,皆确凿可据,何以聚敛之所,独在五百里外,毋亦如敖仓、洛口之类,特设此为窖粟之地,不必附近国都与?前志不载,或因此故老无传,无可据以为考,而杜、马氏博综群书,要非未见,附入古迹,亦疑则传疑云尔。”<sup>⑮</sup>光绪《广平府志》在征引《大清一统志》《水经注》《通典》等文献后所加按语曰:“《通鉴》《文献通考》及《一统志》诸书俱载巨桥于曲周,惟《广輿记》独载巨桥于淇县。考淇县,古朝歌地。纣都朝歌,如鹿台,实聚敛之所,既在淇县之南阳社,巨桥亦鹿台类也,何反远在五百里之外?《方輿纪要》既列巨桥于曲周,又曰淇县东北吴里社亦有巨桥,皆纣积粟处,盖于此亦不能无疑。《通志》谓,载巨桥于淇县,当是《广輿记》之讹,未必然也。”<sup>⑯</sup>该志明显对巨桥仓在曲周的说法存有疑义,更倾向于巨桥仓位于殷都朝歌附近。

从《史记》“盈巨桥之粟”引许慎“巨桥水之

大桥,有漕粟也”来看,巨桥仓具有漕运仓储的性质。史念海根据许慎的说法,推测巨桥仓之“漕粟”可能是由黄河漕运所得推过来的<sup>[16]</sup>。但从浚县距离商都朝歌较近,且拥有便利的水运条件来看,在河南浚县有更多的合理性。巨桥仓正是利用了便利的水路运输粮食并加以存储,在商王朝政权维持、军需开支、都城供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作为最早的漕运仓储,对秦汉、隋唐时期的漕运与仓储建设提供了经验与借鉴,毫无疑问对黎阳仓的设置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嘉庆《浚县志》称“巨桥为黎阳仓之滥觞”<sup>⑧</sup>。

东汉末年,袁绍曾在黎阳(今河南浚县)储藏粮食。《太平寰宇记》引《冀州图》云:“(黎阳仓城),在(黎阳)县西南隅,袁绍聚粟之所。”<sup>[17]1184</sup>明《河南通志》亦载:“(黎阳)仓城,在浚县西南三十里,汉袁绍于此聚粟。”<sup>⑨</sup>北魏时,河北十三州已成为国家财力的主要来源,“河北数州,国之基本”“国之资储,唯藉河北”<sup>[3]380</sup>。

隋统一全国后,实行休养生息政策,太行山以东的河北平原地区农业经济迅速发展,就连河北北部地区也出现了“幽蓟桑叶暗川原”的景象。隋文帝重视粮食储备,广建粮仓,由于粮食连年增产,开皇十二年(592年)时,因国家府库皆满而消减赋役,诏令:“河北、河东今年田租,三分减一,兵减半,功调全免。”<sup>[6]682</sup>隋文帝末年,“仓库盈溢……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sup>[18]563</sup>。曹操修建以邺城为中心的南通黄河、北达边塞的漕运系统,使黎阳仓吸收河北地区仓粮的能力大大加强,为黎阳仓的设置奠定了粮食储备基础。因此,黎阳仓在隋代粮食储备体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隋书·食货志》描述了开皇时期包括河北在内全国物资运送京师的繁忙景象:“诸州调物,每岁河南自潼关,河北自蒲坂,达于京师,相属于路,昼夜不绝者数月。”<sup>[6]681</sup>

### 三、水路发达的交通优势

古代浚县水源丰富,境内有黄河、淇水、卫河等河流,水路交通发达。东汉建安九年(204年)正月,曹操为北征邺城的袁绍,修建白沟水利工

程以兴漕运,建安“九年春正月,济河,遏淇水入白沟以通粮道”<sup>[19]25</sup>。从《水经注·淇水》“淇水又东出山,分为二水,水会立石堰,遏水以沃白沟”,“淇水又南历枋堰,旧淇水口,东流迳黎阳县界,南入河”,“汉建安九年,魏武王于水口下大枋木以成堰,遏淇水东入白沟以通漕运,故时人号其处为枋头”,“淇水右合宿胥故渚,渚受河于顿丘县遮害亭东、黎山西,北会淇水处立石堰,遏水令更东北注。魏武开白沟,因宿胥故渚而加其功也”<sup>[7]235、236</sup>的记载可以看出,曹操是依靠大枋木筑堰堵水的方法,来增加白沟水量,保证白沟具有良好的通航条件。淇水被拦截后的水流从白沟下游与清水连接,船舶可循白沟进入洹水,即今天的安阳河,到达邺城。正是依靠白沟的军粮运输,曹操顺利拿下邺城。在平定北方后,曹操以邺城为根据地,多次通过白沟水行南下,曹丕随父自邺城南征,曾写《于清河作》《于清河见挽船士新婚与妻别》等诗。在修缮白沟,建造堰枋的同时,曹操还在黄河以北修建了平虏渠、泉州渠和新河等水利工程,将黄河、海河、滦河连成互为贯通的水路交通网,沟通了睢阳渠与河北诸渠的联系,大量黄河以南的物资得以通过睢阳渠、黄河、淇水、白沟、清河、平虏渠、泉州渠运往北方,以满足邺都消费及军事需求。

曹操使用大枋木筑堰堵水的地方被称为枋头,位于今浚县新镇西枋城村东北一带。在将淇水引入白沟,实现漕运之后,由于枋头在控扼白沟水运上的重要战略地位,随即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城市 and 军事重镇,成为黄河北侧重要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因称枋头城。此后,围绕枋头城发生了众多战争。如,永嘉六年(312年),后赵石勒与晋朝将领向冰为争夺枋头,发生激烈战争<sup>[20]2781</sup>。石勒夺取枋头后,向北夺取邺城,并最后建立后赵政权。东晋太和四年(369年),大司马桓温率领大军北伐前燕,循白沟北上,渡文石津次于枋头。前秦苻坚率师助前燕,大败桓温于枋头。

两晋南北朝时期,白沟—清河一线作为水路要道,屡有修缮,但因北人擅长陆路运输,不喜水上运输,因而北方运河时通时阻,加之战争、水患及政权更迭等原因,隋朝初年已被弃用。尽管已经湮塞,原来的水道依然存在,只要稍加

疏浚便可通航。隋大业四年(608年),为增大北方漕运能力和北征高句丽,隋炀帝征发广大民众,在曹操所疏白沟故道的基础上开挖永济渠,“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sup>[6]70</sup>。从《元和郡县图志》魏州馆陶县下“白沟水,本名白渠,隋炀帝导为永济渠,亦名御河”,及相州内黄县下“永济渠,本名白渠,隋炀帝导为永济渠,一名御河”<sup>[21]450,454</sup>两条记载来看,永济渠就是在曹魏时期白沟等旧有水道基础上开挖出来的。黎阳仓在大伾山北麓,“其(大伾山)北麓为黎阳仓,自隋至唐宋,皆置仓于此,即仓城故址也”<sup>[22]719</sup>。将其设置于此,毫无疑问与此地具有极为便利的交通及转运条件有关。

#### 四、战略要地的地理区位

虽然隋文帝设置黎阳仓主要是为了转运山东粮食进入关中,但也有辅助经略河北的想法,“黎阳仓的选址、建筑、布局都有军事预设的色彩”<sup>[23]</sup>。黎阳仓所在的卫州,东魏时为义州,后周改为卫州,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年),再改为汲郡,《隋书·地理志》载:“汲郡,东魏置义州,后周为卫州,统县八。”<sup>[6]848</sup>黎阳仓所在黎阳县为汲郡所领八县之一,其建置始于西汉,《汉书·地理志》记载,黎阳县属魏郡。晋灼注曰:“黎山在其南,河水经其东。其山上碑云,县取山之名,取水之阳以为名。”<sup>[2]1574</sup>从《水经注》所云“今黎山之东北故城,盖黎阳县之故城也。山在城西,城凭山为基,东阻于河”<sup>[7]134</sup>可知,汉代黎阳县在大伾山东北,东临黄河。王莽改称黎蒸,东汉复名黎阳,三国魏因之。“后魏置黎阳郡,后置黎州。开皇初州郡并废。十六年又置黎州,大业初罢。”<sup>[6]848</sup>此后,黎阳县历属汲郡、卫州、滑州、澶州,其间曾先后为郡、州、军、府治所,北宋政和五年(1115年)置浚州,辖黎阳县。明洪武三年(1370年),降州为县,并将黎阳县易名为浚县。此后,浚县之名一直沿用至今。

隋时,黎阳襟山带河,黄河横贯境内,是黄河南北间交通要冲,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位于黄河折弯下游的黎阳津,更是汉代以来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黎阳汉以来尝置兵监,聚六郡校士戍屯于此,入隋唐咸列重镇焉”<sup>②</sup>。东汉至

北齐,围绕黎阳的战事不断,《读史方舆纪要》列举有大量与黎阳津有关的战事<sup>[22]721</sup>。

考古发掘证实,隋代黎阳仓位于今河南省浚县城关镇的大伾山北麓。大伾山,又名东山,“南荫黄河,左覆金城”<sup>③</sup>,“峰巘秀拔,若倚屏障”<sup>[22]719</sup>,是黎阳城的重要屏障,而且漕仓修筑在大伾山上,具有易守难攻的形势,是潜在的军事要塞。黎阳仓东邻黄河故道,东北距黎阳城遗址约1公里,西距卫河(永济渠)约1.5公里,并自有巨大的仓城。考古报告显示,黎阳仓仓城系依山而建,其东、西及北面均留有夯土筑成的仓城城墙遗迹,城址平面近长方形,东西宽260米,南北残长约300余米,仓城城墙为夯土筑成,经过发掘的仓城东城墙残宽5.5米,东墙东侧有护城壕,宽3.9米<sup>④</sup>。

隋炀帝开通永济渠后,黎阳仓因西靠永济渠,东临黄河,水运便利,又有高大的仓城为屏障,军事功能更加明显,特别是高句丽战争发动后,包括来自江南及中原地区的漕粮都要储备于此,然后北运,成为隋炀帝东征辽东的粮食和军用物资供给基地。大业七年(611年),“七月,发江、淮以南民夫及船运黎阳及洛口诸仓米至涿郡,舳舻相次千余里”<sup>[20]5654</sup>,次年“八月,敕运黎阳、洛阳、太原等仓谷向望海顿”<sup>[20]5666</sup>。隋末群雄杨玄感、李密、宇文化及等都看中了黎阳仓的军事地位,把夺取黎阳仓作为战略目标。大业九年(613年),杨玄感反隋,乃先据黎阳仓以为经济凭借。大业十三年(617年),“河南、山东大水,饿殍满野,炀帝诏开黎阳仓赈之,吏不时给,死者日数万人”。徐世勣给李密出主意说:“天下大乱,本为饥谨,今更得黎阳仓,大事济矣。”于是,李密派徐世勣率五千人攻取黎阳仓,开仓放粮,兵力迅速得以增强,“破黎阳仓,据之,开仓恣民就食,浹旬间得胜兵二十余万”<sup>[20]5752</sup>。大业十四年(618年)三月,宇文化及于江都发动兵变,弑炀帝于彭城阁,后率众欲入关中,因粮食缺乏,“乃图北取黎阳仓,从白马津而渡”。李密深知黎阳仓重要,闻听宇文化及渡河来攻黎阳仓,“乃分兵遣别将徐世勣等屯黎阳拒守”<sup>[24]53</sup>,确保黎阳仓不失。隋末群雄对黎阳仓的争夺,无疑看重的就是黎阳仓交通要冲的战略地位。因此,《浚县志·兵防考》曰:“隋置仓廩,不惟近

都近水,亦资兵卫也,故李密、王世充等争之。”<sup>②</sup>

## 五、宜于置仓的环境因素

我国早期贮存粮食大都使用地窖,新郑裴李岗,郑州大河村,巩义铁生沟,三门峡庙底沟,浥池仰韶村,偃师二里头,郑州商代遗址,安阳殷墟等中原地区先秦遗址中,都曾发现有储粮的地窖。从考古发现看,直到隋唐时,地下储粮仍是贮藏粮食的最重要方式。

地下仓窖具有结构简单,建造容易,投资少,维护成本较低有防风雨、鼠雀、水火、盗贼等优势,适合粮食的长期安全储存。元朝王祜就认为“深藏胜仓庾”,他在《农书》中说:“夫穴地为窖,……先投柴棘,烧令其土焦燥,然后周以糠稷,贮粟于内,五谷之中,惟粟耐陈,可历远年。……既无风雨、雀鼠之耗,又无水火、盗贼之虑,虽篋笥之珍,府藏之富,未可埒也。……诗云:作窖良有法,贮谷期不腐;焦确拟陶炉,穰粒亲壤土;厚瘞防水潦,深藏胜仓庾。”<sup>[25]529</sup>

此外,地下仓窖主体部分均在地面以下,在战乱火灾等天灾人祸事件中不容易被破坏。黎阳仓在历次战争中都是争夺的焦点,但都完好地保存下来。张舜民《画墁录》曰:“予尝登大伾,仓窖仍存,各容数十万,遍布一山之上。”<sup>[26]1</sup>北宋政和年间黄河改道之后,黎阳仓逐渐被废弃。明正德《大名府志》载:“自政和后,河易故道,始废。”<sup>③</sup>《河南通志》曰:“政和以后,大河南徙,(黎阳仓)始废。”<sup>④</sup>《清一统志》云:“金初河易故道,(黎阳)仓城始废。”<sup>⑤</sup>

但地窖储粮也有一些缺陷,地下潮湿容易使粮食发霉变质。在科技发展相对落后,粮食储存技术还不能有效解决防潮问题的情况下,选在地势较高、土质干燥的地方修建粮仓是重要措施。从天一阁所藏明抄本宋代《天圣令》中复原的唐开元二十五年(737年)《仓库令》可以看出,隋唐时期对地下仓窖的选址是有着严格要求的,《仓库令》第一条规定:“诸仓窖,皆于高燥处置之、于仓侧开渠泄水、空地不得种蒔。若地下湿,不可为窖者,造屋贮之。”<sup>[27]483</sup>宋令也规定:“诸仓窖,皆于城内高燥处置之,于仓侧开渠泄水,兼种榆柳,使得成阴。若地下湿,不可为窖

者,造屋贮之。”<sup>[27]483</sup>除规定仓窖周围种植榆、柳等树木,使形成树荫,与唐令有别外,其他内容均与唐令一致,也强调仓窖要选在“高燥”之地。直到明清时期,还强调粮仓选址要在高燥之处。王士禛《手镜录》曰:“常平仓米谷盛贮,须择高燥爽垲之地,以防沍烂。”<sup>[28]514</sup>阎敬铭《请兴办新疆屯田疏》云:“其余剩粮石择拣高燥之地,建仓存储,以免霉烂。”<sup>⑥</sup>

黎阳仓所在大伾山北麓地势较高,土质干燥,完全满足仓窖选址对水文、地质条件的要求。主持黎阳仓遗址发掘的刘海旺在谈及黎阳仓选址时说:“黎阳仓所在的地方,土质为黄土,直立性好,挖窖不易坍塌,挖好窖后将坑底夯实,窖壁也修整得光滑坚实,然后用火烘烤,除去湿气,再铺设木板、草、糠、席子,也是为了防潮。”<sup>[29]</sup>

正是由于在漕仓选址时考虑到上述因素,黎阳仓成为收储黄河以北漕粮的国家粮仓,不仅在解决京城粮食供应短缺问题上发挥重要作用,更在隋朝征伐高句丽,灾荒赈济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在隋朝漕运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

### 注释

- ①参见(明)丘浚:《丘浚集》第二册,海南出版社2006年版,第572页。②③(清)熊象阶修,武穆淳纂:《浚县志》,清嘉庆六年(1801年)刻本。④(清)纳兰性德:《陈氏礼记集说补正》卷一“曲礼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⑤(明)石禄修,唐锦纂:《大名府志》卷九“古迹志·台宇”,明正德元年(1506年)刻本。⑥(明)李贤等修,万安等纂:《大明一统志》卷四“大名府”,明天顺五年(1461年)刻本。⑦(明)何乔远:《名山藏》卷四七,輿地记二·大名府,明崇祯间刻本。⑧(清)和珅等纂修:《大清一统志》卷一五八“卫辉府”,文渊阁《四库全书》本。⑨(清)于成龙修,郭棻纂:《畿辅通志》卷十“古迹·大名府”,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刻本。⑩(明)侯大节纂修:《卫辉府志》卷一“地里志·古迹”,明万历三十一年(1609年)刻本。⑪(明)陆应阳纂,蔡方炳增辑:《广輿记》卷六“卫辉府·古迹”,明万历年间刻本。⑫(清)任启运:《史要》卷一“商”,清嘉庆刻本。⑬(清)王谦吉、王南国修,白龙跃等纂:《淇县志》卷一“地里志·古迹”,清顺治十七年(1660年)刻本。⑭(清)汪价:《中州杂俎》卷五,民国十年(1920年)安阳三怡堂刻本。⑮(唐)杜佑:《通典》卷一七八“州郡八·古冀州上”,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4698页。⑯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一六“輿地考二”,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8571页。⑰

(清)劳宗发修,王今远纂:《曲周县志》卷九“古迹”,清乾隆十二年(1747年)刻本。<sup>⑰</sup>(清)吴中彦修,胡景桂纂:《广平府志》卷二八“古迹”,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刻本。<sup>⑱</sup><sup>⑲</sup>(明)邹守愚修,李濂纂:《河南通志》卷五十一,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刻本。<sup>⑳</sup>(清)周邦彬修,郜焕元纂:《大名府志》卷一“疆域”,清康熙十一年(1672年)刻本。<sup>㉑</sup>(汉)刘桢:《黎阳山赋》,载严可均辑《全后汉文》,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662页。金城,即黎阳城。<sup>㉒</sup>马晓建,刘海旺:《河南浚县黎阳仓遗址6号仓窖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19年第4期;王炬:《古代大型国家粮仓初露端倪》,《中国文物报》2015-01-09。<sup>㉓</sup>(明)石禄修,唐锦纂:《大名府志》卷九“古迹志·台宇”,明正德元年(1506年)刻本。<sup>㉔</sup>(清)葛士浚辑:《清朝经世文续编》卷六十六“兵政·屯响”,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上海久敬斋铅印本。

#### 参考文献

- [1] 张晓东.漕仓、运河与隋朝大一统战略布局[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07-16.
- [2]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 [3] 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4] 李百药.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
- [5] 史念海.隋唐时期农牧地区的变迁及其对王朝盛衰的影响[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4):31-53.
- [6] 魏征,令狐德棻.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 [7] 酈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M].北京:中华书局,2007.
- [8] 丘浚.丘浚集[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6.
- [9] 孙希旦.礼记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9.
- [10] 管仲撰,黎翔凤校注.管子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4.
- [11] 高承.事物纪原[M].北京:中华书局,1989.
- [12] 孔安国传,孔颖达正义.尚书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 [13] 黄怀信.逸周书校补注译[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
- [14]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 [15] 杨慎作,张三异注.廿一史弹词注[M].北京:中华书局,1938.
- [16] 史念海.春秋以前的交通道路[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0(3):5-37.
- [17] 乐史.太平寰宇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7.
- [18] 吴兢.贞观政要[M].北京:中华书局,2011.
- [19] 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59.
- [20] 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 [21] 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3.
- [22] 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輿纪要[M].北京:中华书局,2005.
- [23] 张晓东.隋朝的漕运系统与政治经济地理格局[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2(3):1-9.
- [24] 温大雅撰,李季平,李锡厚点校.大唐创业起居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 [25] 王祯撰,缪启愉,缪桂龙译注.东鲁王氏农书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 [26] 张舜民.画墁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27] 天一阁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圣令整理课题组校订.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M].北京:中华书局,2006.
- [28] 王士禛.手镜录[M]//张明.王士禛志.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
- [29] 杜洁芳.黎阳仓:千年粮仓重见天日[N].中国文化报,2013-03-28.

## An Analysis of the Reasons for the Warehouse of Water Transport in Liyang County During the Sui Dynasty

Li Qiao

**Abstract:** The Liyang granary was one of the four major warehouse of water transport in the early days of Sui Dynasty. Its main purpose was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grain shortage in the Chang'an of the capital city. However, after the Liyang granary was built, its role in military supply and famine relief became increasingly obvious, it became an important factor to decide the outcome of the war at the end of the Sui Dynasty. The establishment of Liyang granary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agricultural policy, canal transportation System, grain storage technology, military strategy, as well as the geographical position, water transportation conditions and grain storage of Liyang County.

**Key words:** Liyang granary; warehouse of water transport; Sui Dynasty; site selection

[责任编辑/知 然]